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述略

韩洪泉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了政策策略的重大转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统战工作的策略、方法和重点,从而把最广大的爱国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

关 键 词: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上海; 统一战线

DOI: 10.3969/J.ISSN.1672-0911.2015.04.049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11(2015)04-0049-05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转变自己的政策策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和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起来。整个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了卓有成效、颇具特色的统战工作,始终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并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和重要保证。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群众救亡运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指出,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以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1]289-290}。8月25日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了为实现党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任务,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全面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项目编号:2014DL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5-05-23

作者简介: 韩洪泉(1981-),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政治与国家安全教研室讲师。

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1]326}。这些指示和要求,为上海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落实好中央的指示精神,当时上海党的主要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办事处(后改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三人团(时为上海党的临时最高领导机构),认真研究分析了上海统战工作的形势。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虽然不再对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和取缔,但由于执行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对民众运动和抗日团体实行了包办统制的政策。7月22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导下,由上海市商会、市民联合会、市总工会、市农会等13个机关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由该会制定《统一全市救国团体办法》,强调“尽量利用原有组织,毋庸另行组织团体”,规定各界组织之救亡团体,应一律向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登记,并报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批准,凡不履行登记手续者,后援会“可察其情迹,予以相当之处置”^[2]。此外,还以种种名义和形式,对各界群众建立抗日组织、支援前线抗战的活动进行限制。对此,三人团的群委工作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主要的是在统制群众,客观上也是阻碍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别是包办运动,压制民主自由,不过是变了一个方式。”^{[3]940}

为适应这一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上海党组织作出了实现群众工作策略转变的决策,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群众组织形式不束缚在救国会形式下,应在救国会下组织各界救亡协会(先组‘文协’),使各协成为广泛群众组织。”^{[3]94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部署了三项主要任务。一是在群委、工委领导下,充分利用党在救国会群众中的影响,将各界救国会扩大改组为公开的各界救亡协会;二是新组建的救亡协会必须打破救国会狭窄的圈子,采取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各界救亡协会组建时应主动邀请国民党代表和上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理事会,以团体名义加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向社会局登记,使各界救亡协会成为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为广泛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群众创造条件;

三是切实加强党对各界救亡协会的组织领导,在群委领导下各界救亡协会成立秘密党团,贯彻党的群众工作决策指示,努力扩大救亡运动。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上海党组织决定以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占有优势、在社会各界最有号召力的文化界救国会为突破口,推动各界救国会扩大改组为各界救亡协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正式成立,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83人当选为理事。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群众救亡协会,也是一个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界团体。15名常务理事中,国民党员有6人,共产党员有2人(钱俊瑞、胡愈之),左翼进步人士有7人,共产党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文协的影响和带动下,上海市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学生界、工人界救亡协会相继建立起来。原上海各界救国会也相应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简称各协),以各个救亡协会理事会代表联席会议的形式,作为组织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群委和工委按照“抓住中层、联系下层、推动上层”的统战思路,采取灵活机动的工作策略,使各个救亡协会成为广泛的群众组织,成为上海党组织领导各界民众抗日的组织形式。在淞沪抗战的3个月中,各协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扩大群众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任务,在群工二委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下,依靠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基层群众,深入抗敌一线,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慰问队、救护队、运输队、战地服务队,积极投入救国献金、捐献慰劳品、救护伤员、安置难民等各种抗日支前活动,共同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动人篇章。

综上所述,在全面抗战爆发最初的几个月中,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坚决落实中央指示,适应上海抗战形势,创造性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各界救亡协会——为主要组织形式,既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爱国群众,又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正是由于坚持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工作策略,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扩大党的群众基

础，掀起了全市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

二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上海市区及郊县均被日军侵占，只有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占领，上海抗战进入环境更加复杂的孤岛时期。同一天，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刘晓，“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因此党的与非党的干部，亦应重新分配，一部分去战区，一部分环境好的仍留下。工作方式应召〔有〕必要的转变”^{〔1〕389}，要他们针对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工作的策略方式进行调整。中共江苏省委于11月初成立后，先后作出《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确定上海党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继续巩固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与组织群众日常反日斗争，一直到反日的游击骚动，而这些工作中，更加扩大加强严密群众组织与党的基础。”^{〔3〕994}为适应这一策略方针的转变，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采取统战策略，取得与各党各派共同合作”，“还应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来改善我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创造工作机会”，“对英美法各国在原则上还应以争取为主，把斗争中心集于日本帝国主义，应防止对英美法各国过分的磨擦”^{〔3〕995}，同时向各系统党工委明确，应重点加强难民、产业职工、学生、教师等党的基本群众的组织工作。省委特别强调，“只要是反日，不管他本身社会关系若何，我们均争取他到统一战线之内”，“不放松每一机会与每一工作去争取其他政治派别与社团来统一行动”^{〔4〕}。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的特殊条件，以灵活的形式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其中以上层统战工作成绩最为突出。上层统战工作主要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负责，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刘少文。在八办和各协党团的积极努力下，由各界社会名流发起的星期聚餐会应运而生，成为开展统战工作的生动形式。如工商界“星五”聚餐会、文化界“星三”聚餐会等，而发挥上层领导核心作用的主要有两个，即“星四”聚餐会和“星

二”聚餐会。由八办和各协党团直接领导的“星四”聚餐会又称九人核心组，参加者先后有上海各界名流近20人^{〔5〕}。“星二”聚餐会由胡愈之等发起，基本骨干力量有宗教界、救济界、文化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工商金融界、工部局高级华员等各界代表人士约40余人^{〔6〕}。上层聚餐会的公开名义是社会名流联谊聚餐会，藉以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研讨问题，实际上则是党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扩大政治影响、推动进步爱国运动的重要基地。刘少文经常以八办代表的公开身份出席聚餐会，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增进与各界爱国人士的相互了解、团结与合作。上层聚餐会的成员大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特别对各界上层人士有一定号召力，与英美法租界当局有较密切的联系。中共江苏省委有关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的重要决策，如节约救济运动、难民教育工作、支援新四军活动等，经常通过王纪华、王任叔等在“星四”聚餐会上提议并征求意见，再扩大到“星二”聚餐会上进行可行性讨论，布置落实任务。这些活动大都得到聚餐会成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从而增加了活动的保护色。上层聚餐会还通过与会人员的社会影响力，努力解决孤岛斗争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营救被捕人员、支援护关护邮斗争、群众改善生活斗争、借用地方协会国际电台开展国际宣传等等。一部分文化界、工商实业界上层人士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如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保险公司总经理胡咏琪和该公司副经理陈已生。他们入党后，以自己身份作掩护，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陆续派中统、军统各派系骨干力量返回孤岛恢复力量，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和八办决定仍坚持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其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刘少文以八办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驻沪代表联系，并通过姚惠泉等上层人士与国民党主张抗日的人士接触，争取他们团结合作抗日。

孤岛后期，上海抗日斗争的环境更趋恶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相应作出调整。在组织群众的形式上注意克服“左”倾影响，强调“变大规模的政

治性质的群众团体为生活互助娱乐性质的小团体”，在群众工作中“把握群众生活要求，以群众经济生活及文化事业为日常工作，展开福利合作事业，提高群众政治水准”。如领导上海各业工人开展改善生活斗争，号召与组织各业工人、城市贫民开展生活互助合作及创办各种消费合作社，既掩护了党组织的活动，又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在上层统战工作方面，要求各团体抓紧租界尚未沦陷的有限时间，逐渐从以利用英美法租界的合法为主转变到以利用日伪的合法为主，各团体均为实现这一转折做了一些应变工作。如职业界决定让孙瑞璜等抗日态度明朗的上层知名人士逐步隐退并加以保护，转而请出一批与汪伪有一定社会关系但为人正派的知名人士担任团体名誉职务，必要时则请他们出面与日伪周旋，从而使团体得以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存在并有效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在整个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和八办密切配合，把握越公开越秘密的方针，一方面通过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的各种联谊会或聚餐会的形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坚持“转向生产，深入基层”，创造性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充分利用孤岛的有利条件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坚持上海抗日救亡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1941年12月8日，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在同一天派兵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从这时到抗日战争胜利，是上海全面沦陷的时期，也是上海抗日斗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急剧恶化的斗争形势，对上海党组织保存和巩固党的力量、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为在做好在日伪残酷统治下坚持斗争的准备，早在1940年5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在国统区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7]。10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致电江苏省委对上海党的工作方针作出明确指导，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中央对敌占区工作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3]1023}。上海全面沦陷后，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了

“更深入精干隐蔽”的要求，强调把各项工作从适应于租界孤岛的环境，转变到适应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环境。特别是1942年8月江苏省委奉命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后，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及全体党员，在艰难困苦复杂斗争环境中，按照中央指示和江苏省委（华中局城工部）的指导，严格而富于创造性地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政策，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革命力量得到了保存、积蓄和壮大。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开展统战工作的两条主要方针，一是“三勤”（勤学勤业交朋友），二是“三化”（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这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政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特别是“三勤”方针，“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8]，是党员“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的与时俱进和具体要求。根据“勤学勤业交朋友”要求，党员不仅要有职业掩护，而且要勤业精业，并以此取得巩固的职业地位和群众的信赖。在学校的要用功读书，在职的要努力学习、工作，同时要广交朋友，争取团结更多群众，每名党员都要成为紧密联系并且善于影响、推动群众的中坚力量，从而使党组织真正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各系统组织，按照“三勤”方针的精神首先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收缩领导机构，统筹安排力量，实行分散经营，使党的力量进入到重要产业部门、要害单位去，以有限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注意保存党的统战阵地，坚持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准备长期斗争。以职委为例，上海全面沦陷之初，对于银联、保联、华联、益友社等店员团体还要不要、能不能办下去，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慎重研究，这些团体在组织机构上调整了理事会成员，让那些已引起日伪注意的成员退下来，由不任伪职又能为日伪所接受的上层人士出任理事长，聘请社会名流担任名誉职务，同时取得社会慈善机构的支持和配合，以公益

团体名义向汪伪政权的社会局立案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在活动内容和方式上，一方面收缩面上的活动，把重点转到各行业和基层中去；一方面强化生活福利、社会公益等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团结，维护了党的下层统一战线。再如工委在工作中，要求地下党员注意结交那些技术高、业务精的老工人、老职员以及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关键人物，通过做好他们的工作，架起争取、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桥梁，使更多的群众向进步力量靠拢。对于那些担任那摩温、副领班、书记工之类职务的人，地下党也不完全把他们视为“资方走狗”，而是区别对待，努力争取团结，同时鼓励党员钻研技术，争取担任这类职务以更好地团结群众。以大康纱厂为例，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该厂党员发展到52名，其中担任那摩温、副领班、书记工的达20余人，从而成为沪东地区一座堡垒工厂^[3]^[1320]。

通过执行“三勤”方针，同样使党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日本对上海的残暴统治和经济掠夺，激起了各方上层人士的不满，他们同时又对抗战前途忧虑重重。上海党组织通过地下党员加强同他们的联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文化界等上层人士交朋友，鼓励他们站稳爱国立场，不受日伪的威逼利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45年春，上海地下党邀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使他们从事实上看到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决心和成绩，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了解信任。上海培福药厂厂长闻余堂，主动表示愿意到根据地去看看，经党组织安排到淮南根据地参观后，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留在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卫生部的工作，而且在上海医药学界产生了很强的辐射效应。在闻余堂的影响下，一批沪上医药专家纷纷前往淮南根据地参观，有的还毅然告别大城市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如1945年5月，在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沈霖春教授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举家迁往淮南

新四军卫生部驻地，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军医大学工作^[3]^[1321-1322]。在教育界，经文委的梅益做工作，南通学院（原南通大学，抗战爆发后迁沪而改名）代院长郑瑜同意把学校迁离敌占区，于1942年秋迁至淮南铜城镇办学，虽为期不长，但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文化界，文委系统党员继续加强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把工作拓展到话剧、京剧、越剧、沪剧等领域，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全面沦陷后，党组织在严酷的环境中深入隐蔽精干，坚持勤学勤业交朋友，在各条战线巩固和拓展了党的统战工作。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上海党组织根据“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的新任务，进一步加强对各阶层的动员组织工作，广泛发动和开展“天亮运动”，激发了各界爱国群众的抗日热情和必胜信心，为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环境。

【参考文献】

-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269.
-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真理(1937.12.9-1938.7.15)第一期到第十六期合订本(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1辑).上海:1987:109.
- [5]《王纪华纪念集》编审委员会.王纪华纪念集[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238.
- [6]李文杰.职业界救亡运动的片断回忆[M].中共上海市委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4.
-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56-757.
- [8]周恩来.关于“三勤”政策[J].中共党史资料,1986(18):2.

(责任编辑:周 凤)